

周 洁 著

生命的另一度

——由海德格尔运思生命的有限性而来



中国商业出版社

本研究得到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专项资金资助

生命的另一度

——由海德格尔运思生命的有限性而来

周 洁 著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另一度:由海德格尔运思生命的有限性而来/
周洁著.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044-8759-9

I. ①生… II. ①周… III. ①海德格尔,M. (1889~
1976)—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9936 号

责任编辑:武文胜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63180647 www.c_cbook.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艾普海德印刷有限公司

* * * *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12.25 印张 159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2.00 元

*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作者简介

周 洁，男，1973 年 1 月生，海南昌江人，1993 年就读于海南大学中文系，现为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讲师。大学期间，曾先后选修陈家琪老师的“现象学导论”、张志扬老师的“存在哲学”，就此走上哲学的道路。早年曾一度沉迷于海德格尔哲学，深耕《存在与时间》，试图借助海德格尔沉入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中。后来到复旦大学求学时，师从刘放桐教授，主攻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博士论文的选题为沃格林的古典视野。多年的“西游”经历让其更为留恋故土的气息，越发回顾故乡的消息，关注本土的命运，近年来，总会自觉不自觉地留意当代本土文脉，默默地祝福这一文明。

自序

如果我们能够活一万年，那么我们现在还会拼命地工作和学习吗？先休息两千年再说，如何？只是不能这么假设，我们没有机会去体验两千年甚至一百年以后的世界。我们从死亡中起来又向死亡走去，但我们却还活着。

大千世界真是神奇。人生在世就是一种神奇和神秘，这种神奇神秘不仅仅是我们正在生存着，活着，更为神秘的是，我们都知道自己必将会死，但死究竟是什么却难以认知。死亡是生命的另一度，有别于我们正活着的这一度。这另一度对活着的我们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够在活着的时候通达它吗？死亡对人生有意义吗？抑或此“另一度”仅仅是人们的虚构，死亡是绝对的虚无？死亡是否是罪的显现？

只要我们面对自身的生命或人类的生存，作为另一度的死亡问题，总会以种种方式悄悄潜入我们的意识，成为我们绕不过去的晦涩难题。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许多思想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切入过死亡问题。甚至，死亡本身以事件的方式直接进入历史中的生存，成为人类生存的一部分。如，中国传统中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故事，本身就是一种以死见生的生存认识，即用死来定义生，用生命的另一度来规定这一度的意义。在西方，从苏格拉底之死到耶稣之死，直接形成了思想事件，千年来不断激励西方思想界进行追问，从而成为强大的意义源泉，邀请后世生存继续关注人的生命存在。

在此类事件中，死亡都将生命的这一度和另一度同时向人显现，生存和生命自身的复杂也在这一显现中得到显明。但与此同

时,死亡的神秘并未因此而有所降低,相反,却大有加强之势。

在古代,因为巫术的存在,生命的另一度是生命自身的一部分,生与死如影随形前后相伴,是生命生存的两个方面。除了这一度的生之显现,另一度的隐藏也在生存中得到昭示。可以说,在巫术世界里,生存中生与死这两个维度都被维持在同一个生存空间中,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经历或体验着死亡。死亡与生命并非绝对对立的两极,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两个度,尽管另一度可能令人恐惧。在活着的时候经历或体验死亡是这种生存方式的一个特点,它让生命生存变得更加丰富和充盈,开启了生命生存的独特视野,让生命的神秘闪进生存,敞开了生命的想象空间。

到了科学时代,在发现巫术的本质是迷信的同时,也将巫术视野敞开的另一度重新关闭,因为它也是迷信。就如同天空已变成可人工测量计算的几何物理空间一样,人的生命生存也在现代科学中变成可计算的物体。其结果是,天变成了一维的物理空间,人可以任意在其中划分各个区域,以便更精确地“认识”或“开发”天空;从此,天不再是超越力量的栖居之所,也不再是人间道义或生存秩序的来源,而是人类雄心勃勃地征服的领地。生命的另一度变成了传说,不再是生命生存应有的秘密,而是生命的死敌,是必须克服的生存障碍。在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另一度,而是生命的对立面,是生存的结束;如果不能回避死亡,人的生命生存就会终结。死亡自此成了生命生存没有底色的黑暗或黑洞,会整个地吞噬人的世界,是个人世界的终结者。

因此,必须克服死亡,即使克服不了,至少也要推迟及回避。这似乎已经成了现代生命科学认识的一个教条。在这里,人们认识死亡并不是要接近它,更不是要把它重新引入生活世界来丰富人的生命生活,而是为了“克服”它——尽可能地延长生命的生存时间。死亡成了生存的结束,代表人类抗拒的失效。死亡不再是生命生存的一部分,而是必须避开的毁灭性力量。

自此,死亡被人从生命生存中极力排除,由这一度和另一度构成的生命世界被人为地压缩为仅由这一度构成的世界中,生命

世界的空间少了一半,人对生命超凡的体验也由此失去了一个独特的维度。生活世界的物质正无限丰富,但生命却变得比以往更加单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生命吗?那黑洞般的死亡究竟是何物?我们为何会惧怕它?我们已经进入科学时代,一切秘密不都将大白于天下吗?

然而,科学将解开人类秘密的承诺迟迟没有实现,死亡越发神秘。上述问题非但没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有所减弱,反而在科学日益昌盛的今天愈发紧迫。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现代人越发自信生命现象最终将完全向现代人类敞开。现代科学与技术的成就似乎也在证实这一点。死亡似乎不再是人们认真对待的问题,因为它无非是一种生命现象,即生命的终结。现代人的这种感受是将生命局限于生存中的现在时这一层面,而把过去时与将来时遗忘了。现代社会让现代人的生命存在变得比以往更加单薄。

现代思想没有忽略这一点。海德格尔是较深入地体察到这一点的思想家。从早期的《存在与时间》到后来的《哲学论稿》,海德格尔对现代生存方式带来的浅薄都有很深的体会。现代社会借助科技的力量,积极“征服”世界,将万物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了达到最终的“征服”目的,甚至将人也降低到物的地步,即人不再是一个有思想会思考的智慧生命体,而是一个善于生产的智能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现代精神从霍布士开始,重新评价了精神结构中理性与欲望的关系,再次肯定欲望的合法性,为欲望正名。这为西方的人类社会启动了大规模物质开发与生产的步伐;借“人性”的名誉,欲望开始大行其道,人从其崇拜向往的超越性中脱落,经人性而降到物性的境地,最后落到身体欲望的色情体上。现在回过头来看,人在现代性的降解之沦落状态真是触目惊心。然而,这还不是最后的结局,更大的未知的不确定性还在后面等着现代人。

海德格尔较早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将其放置到更广阔的哲学视野中来沉思。就海德格尔自身的思想历程来看,他对包括生命生存的世界的沉思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早期的生存论阶段;另一个是后来的存在论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海德格尔试图从人的存在即此在进入存在,通过人的生存来展开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海德格尔通过 Sein 向 sein、das sein、ist 的转换,在人的生存中将存在在一个个存在者中“是”出来。即,通过人的生存状态进入存在,在人的生存中显现存在。我们存在,周遭世界存在,但存在不会自动显现,它有待于作为此在的人类去追问,去探索,并在人的追问中将自身的意义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存在就在那,万物如其所是地存在着,我们却看不见存在;但作为此在的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生存的探问将其意义展现出来。此在就是那个能够追问存在之意义的存在者;与此同时,此在也是要死者。死是此在的基本规定。人注定是要死的,只是死的时间、地点、方式难于确定。人从一出生,就开始走向死亡。正是死逼问着生的意义,让人在他的生存过程中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让自己的生存与世界的存在产生关联,思考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如果没有死亡,这样的情况也许就不会出现。死亡让人的存在变成了有限存在,而世界却是无限的,有限的人生与无限的宇宙到底有何关系?人在这有限的生命时间里能够做什么?这样的问题就会随着死亡在人的意识中出现而出现。人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就是对虚无的恐惧,克服死亡实为克服虚无,即人生不应该是虚无,人活着就是要活出意义来,以回应虚无的威胁。虚无是死亡带来的巨大黑洞。而对虚无的抗拒同样是因死而来的意义追问。死亡绝非生存的消极因素,相反,它倒是人生寻求积极意义的源泉。人对自身价值的评估与期待正是死亡带来的虚无黑洞所激发出来的。在面对人是会死的这一事实中,人学会了体验时间,知道会有虚无,也知道世界万物的存在是如此不同,更知道生命在其存在中已经悄然展开了自身不同的向度,自己呼唤,自己应答。当然,也包括对呼应的听而不闻,无动于衷,让生命生存自然隐匿于茫茫

世界之中,死亡变成了真正的黑洞,吞噬着人的自以为是,直至虚无。在这样的状况中,死亡不再是对虚无的克服,而是虚无的降临。

“存在还是不存在?”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过去,反而因为死亡而变成了永恒的问题,逼迫着一代又一代人去追问自己生命生存的意义。在这个追问中,人成其为人而不是其他存在者。这个存在者即缘此关联着存在,指向存在,回归自身的生存秩序。

但这一阶段的追问却因追问者企图仅仅凭借自身的存在直接通达存在本身,让存在自身的意义在追问者的追问中全方位显现,这一进路最后呈现给我们的是以此在为中心来展开的生存结构。无论以此在为中心的生存结构展现出多少令人惊喜的成果,它依然无法达到海德格尔最初的目标,即存在本身的意义。因为这一追问方式本身所指向的就是一种静态结构,倘若把存在设想为一种静态结构,那么,海德格尔无疑又要落入他毕生反抗的形而上学陷阱之中。这种静态追问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找到一条新的道路。

在面临自身思想岔路之时,海德格尔显示出了惊人的应变和反省能力,最终走出了形而上学的陷阱,全面放弃此在中心论的静态追问,转而开辟出“显—隐”一体运作的动态显现道路,即在保持存在与存在者亲密区分的同时,让存在“显”而为存在者,“隐”而为存在。而“显”即“隐”的双向动作让两者无法完全分离区别。自此,海德格尔走上“显—隐”二重运作的存在动态追问的道路。在这条道上,死亡已经不再仅仅是此在自身的规定,不是此在的最后结局。相反,死此时已经是生命生存的“另一度”,明确区分于“这一度”。此“另一度”不再是此在“这一度”的终结和“另一度”的开始意义上的“另一度”,似乎两者是一条线性结构的两段,一段的结束是另一段的开始。事实上,此两“度”是人的生命生存同时并存的向度,都是人的组成部分。只是“另一度”的存在让人在活着的时候就经历了死亡,知道生死之间的关系,理解

生命的终极意义所在。

海德格尔此时听到了古希腊遥远的呼唤，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条路。应着这另一度的呼唤，人终于看到了冥府。那不是生命的终结之所，而是人的终极归宿。在那里，人将为其一生的所作所为承担一切后果，人的最终位置将由其生前的行为决定。重要的是，人用不着等到真正死后才在冥府审查中知道自己的最终结局，而是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理解冥府的全部意义。冥府的意义不是消极的审判和惩罚，在安排人的终极位置之时，它是公正的审判官，公平公正地为每个人安排他应有的位置。

现在，人的“向死而生”对应着冥府的终极安排，人已无法回避他的“另一度”。他不能指望死后一了百了。此“另一度”就开启了“向死而生”的另一种视野，人的生存已经不仅仅是从生走向死，并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到死对生的意义，而是活着的时候就已经经历死亡，用死来确定生的意义。生命生存的意义范围在此大大地拓展开来。

随着清理形而上学步伐的加快，海德格尔主动中断了“向死而在”，在探索中开启了“另一度”。前者属于生存论，后者属于存在论。前者为海德格尔带来了无尽的声誉，《存在与时间》一度被许多学者称之为“代表作”，但海德格尔却在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主动中断了这一层面的探索。如今，八十多年已经过去了，生命科学的发展早已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成就，人们还在饶有兴趣地谈论死亡，但死亡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不是人越来越长寿，而是死亡作为生命生存的意义来源被现代科技遮蔽得越来越深。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海德格尔的沉思？是因其“不科学”而理应放弃吗？

科学一度许诺将揭开生命的秘密，包括死亡的秘密，但事实却是，科学在其探索中将生命的意义更深地遮蔽了，作为生存意义主要来源的死亡一道被遮蔽。此遮蔽乃现代人类的一种自我欺瞒，其本质不过是现代版的掩耳盗铃。漠视死亡，或故意遗忘死亡，是死亡黑洞化的主因，现代单薄的生命恐将面临“人是机

器”这一宿命。

但我们相信，身处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现代思想有能力应对困局。尤其是身处世界文化另一类型的中国人，有更多的思想资料应对由西方现代化而来的技术困局。中国人的德性同希伯来的超越性一样，是东方调和西方物性的思想源泉。

海德格尔直面古希腊冥府的呼唤在东方是可以被听到的，他的“向死而生”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并非是一种不可理喻的玄想。中国人的“知其白，守其黑”同样可以转化为“知其生，守其死”，守住了死，就把握了生。或许，中国人的矛盾辩证转化思想语境比西方思想语境更容易理解海德格尔，或者说，海德格尔更容易在中国找到知音。中华思想的博大玄妙更适合在现代条件下重新整合现代思想，为人类克服现代性危机提供新的契机。

“知其生，守其死”完全可以重新敞开“向死而生”的思想境遇，为其死而重生创造条件，也为现在还在活着的我们敞开生命生存的鲜活的意义源泉。为此，我们谨慎携手海德格尔在中国人的“知其生，守其死”的思想境遇中，重新面对死亡。

周洁

2014年7月29日于海甸岛

引子：拒死的西西弗与赴死的苏格拉底

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从未成功地使这块巨石立于山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它总是在刚上山顶时复又滚下山去。尽管西西弗满怀激情精神抖擞义无反顾，但他这激昂的斗志很快就因为这样的重复而干瘪变为毫无希望枯燥无味的机械运作。他激情饱满的努力也变得跟石头的滚动一样了。这种机械的重复使他失去了对家乡的记忆，丧失了对未来的希望，连死的未来都没有。这是一种连悲怆都说不上上的处境。加缪于是将这种生存处境归结为一种荒谬的惩罚。但是，如果西西弗意识到他的真实处境并感受这样的处境，他马上就进入了一种悲剧境界里，从而激起了新的思考与想象，那么，他的境况就会有所改变。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西西弗的处境是可以转换的。即，如果西西弗不是麻木机械地重复推石头的动作，而是接受了这种处境，把推石头看成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从而充满激情地推下去，直至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都对西西弗形成一个世界，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①

面对西西弗的处境，加缪给出了两条走出荒谬的道路，第一是结束生命，以终结这无止境的荒谬的重复，恢复生命的悲剧意识，从而赋予生命以意义。第二是承认事实，认清自己的处境，并赋予它以意义，即只要积极行动，那么当下的行动就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人生的意义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死亡，二是行动的价

^① 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45页。

值。这两种选择都是对虚无的拒绝。生命生存不能没有意义。

加缪以终结生命的方式来拒绝生存的无意义,很大程度上代表现代哲学对生存中的虚无的忧虑,也从另一个角度突显了死亡问题的重要性。死亡又以它的方式闪进了现代思想。其实,无论是生存论上的死亡还是存在论上的死亡,在西方思想史上都有其重要位置。

西西弗为何成为荒谬的象征?假如西西弗会自杀,情况会如何?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即便我们像加缪一样赋予荒谬以丰富的意义,由此而来的问题还是令我们焦虑不安——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加缪那里,死亡是人在无意义的生存处境中升华生命的唯一法门,是死亡让生命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重新获得了它应有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于,个体生命可以自行选择结束生存的方式来拒绝虚无与荒谬。加缪的论述在应急层面上是有意义的。从时间上看,加缪那一代哲人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曾经认为理性、美好的世界在短短几年内被战争摧毁。欧洲人在这场战争中失去的,不仅仅是世界中心和世界霸权,也不仅仅是盛极一时的繁华,更重要的是,欧洲人曾经笃信不已的理性和信仰都连同那些辉煌一时的建筑被摧毁了。他们不得不一遍遍地问自己,如果人真的是理性的动物,如果人真的拥有理性,那么怎么会有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的发生?怎么会有奥斯维辛营和南京大屠杀?如果真有上帝,且上帝是慈悲的,关心人类疾苦的,那么他怎么会允许这样的苦难发生?总之,对理性和上帝的质疑从内外两方面摧毁了欧洲人的信心。对理性的质疑让人自己靠不住,对上帝的质疑让外在的信仰成为幻象。这个世界已经完全陷入了虚无之中,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生命生活的意义已经无从谈起。加缪这一代思想家必须主动担负起重塑时代意义的重任。正如西方理性的源头是希腊一样,意义的源头也得重新回到他们所熟悉的精神故乡希腊。

希腊于西方有着特殊的意义。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第

一卷“希腊哲学”的“引言”中就开宗明义地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欧洲人远从希腊之外，从东方，特别是从叙利亚获得他们的宗教，来世，与超世间的生活。然而今生，现世，科学与艺术，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①

欧洲人加缪这次回头看希腊的时候，能够启发他的已经不是希腊的哲学与悲剧，而是神话。必须回到神话上来。加缪没有回到俄狄甫斯的斯芬达克斯之谜上来重新理解人之谜，而是回到西西弗那里，从荒谬中寻找意义。或许在他看来，生活的意义比人之谜要来得紧迫，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不值得探寻其秘密的。跟他的同时代哲学家萨特一样，加缪渴望当下的生活意义，必须赋予当下的生存以意义。而西西弗在每天重复着的相同动作中却找到乐趣，从而得到了幸福，并因此逃脱了惩罚，最终回归正常。离开荒谬与虚无回归正常是加缪寻求的，或者说正常是对荒谬与虚无的克服。既然传说中的西西弗都能从单调的重复中找到工作的意义，从而克服劳作的无意义，那么现代人当然也可以用赋予自己当下的劳作以意义的方式来克服眼下的荒谬危机。加缪还有选择自杀作为生命意义的出路，显示出他对生命的尊重。但是，他仅从当下的意义来回应时代的危机，显然克服不了欧洲战后的虚无主义，甚至还隐藏着新的虚无主义危机。因为当下的意义已经天然地隐含着“及时行乐”的只顾当下而不管将来的虚无主义因素。加缪没有注意到，西西弗曾经成功地锁住了死神，让人间远离死亡。西西弗的这一动作表面上是为人间扫除灾难——人的会死性是上天对人的最大惩罚，事实上却是从根本上否定人的一切意义的行为。因为死亡是人的终极意义之源。当然，这里的死亡指的是人的根本属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7页。

如果将死亡当成一种现象,那么死亡的形式很可能会将问题的属性掩盖。如战争或犯罪带来的伦理问题会遮蔽甚至取代存在论意义层面的问题。死亡始终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如果西西弗真的一劳永逸地锁住了死亡,人类从此永生,那么,拥有知识而获得永生生命的人类跟人还有区别吗?那将意味着人的彻底死亡或消失,因为人作为一个类已经不复存在,人通过自身的努力已经升级为最高者了。在这个意义上,逃离死亡只是人类的一个幻想,即幻想人有一天可以成为不死者。但这样的设想可能从未想过,如果人真有一天是不会死的,其结局未必是无限者,而很可能是永生的机器。按照古希腊的神话经验,神是智慧的拥有者,人的智慧只不过是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从而向神学习智慧;人获得永生并未就此自然拥有智慧,更大的可能是,因为生命永生时间无限,人从此失去了学习紧迫感,因而不断地拖延学习的时间,以至于忘记了学习这回事,最终成为一个只会傻乎乎地娱乐不死的机器人,或一台最终遗忘了自己身世与身份的不死的机器。

如此看来,永生可能不是人类的福音,死亡也不是人类的苦难之源,如何认识死,如何死才有意义,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死亡本身就是一个有待沉思的问题。

《西西弗的神话》开篇便提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①。这是一个苏格拉底式的现代表达。《理想国》第一卷在讨论正义问题时,苏格拉底的中心议题即“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为维护城邦与个体灵魂的秩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容赴死。现在加缪将赴死解释为为了生命的意义,有意识地选择自行结束生命行程的个体行为。死亡成了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在苏格拉底那里,赴死不是简单的“英勇就义”,而是对“知无知”的实践,不以无知为有知。因为死到底是什么?无人能够回

^① 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

答。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人是否有来世？人死后是否可以见到从前曾经活过的人？另外一个世界是比这个世界好还是坏？诸如此类的问题，仅靠人现有的知识是回答不了的。苏格拉底深知其中的深浅，不肯轻易下判断。尽管他热爱判处他死刑的雅典城邦与雅典人民，但当面临生死抉择之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虔诚，从容就义。死亡在苏格拉底这里成了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

所谓真正的哲学问题指的是，它成为一个永恒的难题，千百年来不断地激发无数思想家殚精竭虑，去探索它的秘密。真正的哲学问题从来都不是思想家有意设计的难题，不是思维游戏，而是事关人类生存的重大问题，能够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提出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发出真诚的邀请，呼唤后世有担当的思想家来为人类的生存共同思想，为人类的未来划定方向。而死亡是人自身的一种属性，是人与超越者的界限所在，是人自身的一个秘密，直接规定着人之为人。因此，它是哲学回避不了的问题。死亡的形式有多少种，它带来的问题方式就会有多少种。奇怪的是，加缪却把“自杀”看成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难道自然死亡、大屠杀等犯罪死亡就不会是“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亲身经历二次世界大战、了解奥斯维辛苦难悲剧的加缪不可能忽略大屠杀问题，一个可能的解释应该是，对一个个体来说，当他处身荒谬境地毫无意义地生存的时候，自杀是唯一能够唤醒生命意义意识的因素。加缪的问题是，当人不幸生在一个荒谬的时代，生活已经变成毫无意义的机械重复运动，人唯一能决定的，可能只剩下是否主动中止这种无意义的生命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此处的自杀已经是死亡的全部形式，没有之二。可以这么说，加缪的真实含义还是在说“死亡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是加缪对死亡的理解过于现代，以至于死亡的最高（真正）形式只有自杀这一条。他对死亡的理解已经脱离了古典的处境，这从他关注的神话传说人物对死亡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来。从荷马史诗和其他神话传说的记载来看，西西弗曾经锁住了死亡，让死亡一度远离人间。也就是说，西西弗一度取消了死亡问题。从积极的意义来

看,是西西弗心怀让人升级为无限者的良好愿望。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在没有解决智慧问题之前考虑永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将葬送人之为人的现实,从而将人变成没有追求的永远简单重复运动的机器,让人成为永恒的行尸走肉,是人彻底降解为物的表现,而不是趋向无限者的表现。

与西西弗不同的是苏格拉底毅然选择死亡,从容就义,使“苏格拉底之死”成为“苏格拉底审判”,成为永远的问题,不断地激发人们对雅典进行发问甚至是审判,直接颠覆了雅典的审判,致使原告和被告位置互换,审判者被审判——雅典从此被推向历史的被告席,接受千年审判。这一审判眼下还在继续,并相继引发各种问题的讨论,成为西方思想的一大源泉。永生不会成为真正的思想问题,它只能以死的反面进入思想,或者说,它只不过是死亡的另一度。换句话说,如果死亡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那么永生就是一种浪漫的人生想象,是死亡激起的回响。西西弗强行绑架了死神,企图回避人类的要死性,其实质是回避人生意义的问题。加缪没有看到这一层,因此将死亡抽象为自杀,必定削弱死亡的意义空间,从而减弱了他对死亡问题的思想强度。从最终的结果看,尽管加缪同他的法国同胞们一道,用他们的“生存主义”激发了法国的思想界,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使他们的祖国法国在 20 世纪下半叶在思想文化上成功崛起,占据了西方思想界的半壁江山,但是,其应急式的思想也注定走不远。当年轰轰烈烈的后现代思潮如同当今短命的流行文化一样,红极一时之后就开始退出舞台。我们今天回头一看,加缪的荒谬理论确实反映了战后欧洲普遍消极的生存状态,也为他的时代对应这种消极提供了他的回应,但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海德格尔相比,就显得单薄得多。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海德格尔始终紧盯存在问题,变幻着各种方式进入存在,将问题层层推进,给后世留下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思想是苏格拉底式的,他接过苏格拉底的追问,在生存层面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但他思想的起点却是生存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其中,死亡问题是其追